

## 建阳余氏刻书考略(下)

肖东发

### 三、余氏刻本的特点及影响

#### 一、余氏刻本特点的分析

建阳书林余氏，作为一支著名的刻书世家，世代连绵相沿，因而在中国版刻史上，无论其版刻内容还是形式，都具有一些共同特点，并且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因而也就较为突出地成为建阳坊刻事业的典型代表之一。

#### 1. 内容方面的特点

余氏刻本的内容十分广泛，既有供文人操觚射鹄的经史文集，又有供平民日常应用的类医卜算，下面就所知见的二百一十三种余氏刻本，列表做一分类统计：

朝代	分类														史部合计	子部总类	儒家	兵家	法家		
	易类	书类	诗类	礼类	春秋	五经总义	四书	小学	经部合计	纪传类	编年类	传记类	史抄	政书						史评	地理
宋	1	3		4	3				11								0				
元	2	3	5	1	1		3	2	17	1		2		1		1	5			1	
明	3	3	2	4	1	3	5	5	26	3	5	3	3	1	6	1	22	2	2	1	3
清					1				1												
合计	6	9	7	9	6	3	8	7	55	4	5	5	3	2	6	2	27	2	2	1	4

种数 朝代	分类											
	医 家	天 文 算 法	术 数	宗 教	类 书	子 部 合 计	总 集	别 集	小 说	曲 类	集 部 合 计	丛 部
宋	3				2	5		1			1	
元	4				3	8	1	3			4	
明	6	2	6	2	26	46	27	5	28	2	62	1
清							1		1		2	
合计	13	2	6	2	31	61	29	9	29	2	69	1

从上表可以看出，余氏刻本中占比重最大的主要是三类书：

①科举应试之书。即四书五经、小学、史评、总集等书。经史百家名著在官刻、私刻中并不少见，然而它们大都力求“仿古”，因而就有拘谨保守之弊。而余氏刻本不拘一格，在刊印这些书时，往往进行不同程度的加工，如添制插图，增印汇刻各种注疏等。正如岳珂在《愧郈集》中所说：“场屋编类之书，建阳书肆日辑月刊，时异而岁不同，四方传习。”<sup>①</sup>仅《四书》就有集注、大全、精义、会解、讲义、说苑、图解、句意句训、名物考以及拙学素言、披云新说、梦关醒意、萃谈正发、兜耍妙解、天台御览、目录定意等多种名目。辽宁省图书馆藏有一部余应虬刊的《首阳楞古奇编》，从书名上看不出该入何类，一翻内容，即是《四书人物考》原文。再如史部的《通鉴》、《纲鉴》、《纲目》，集部的《文章轨范》、《诸子品粹》等均属此类。王重民先生在余氏双桂堂所刊《周易传义大全》一书的提要中指出：“是书为明代功令书，学子们所必读，除《五经大全》本外，坊间翻刻必多，乃诸家绝少著录。或因坊刻差讹，见弃大方；今则有志搜访者，已不易得矣。”<sup>②</sup>

②民间日常参考实用之书。宋、元、明三代余氏都刻了不少医书、类书。这些书为广大中下层民众所重视和欢迎。尤其是广收博采、分门别类、包罗万象的类书，更是民众日常生活中不可

缺少工具书。其中有社会交往的参考书，如《往来翰墨分类》、《雅俗便用折梅笺》；也有劳动人民实践经验的总结，如《博闻胜览考实全书》、《万用正宗不求人全编》；还有启蒙普及读物，如《故事启牖》、《艺林寻到源头》、《小学日记故事》等。这类书不仅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起过重要的普及文化的作用，就是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正如郑振铎先生所说：“斯类通俗流行之作，为民间日用的兔园册子，随生随灭，最不易保存……研讨社会生活史者，将或有取于斯。”<sup>③</sup>

③通俗文学之书。宋元两代余氏只是刻了有限的几种诗文总集和汉唐几家别集，通俗文学作品尚未得见，到了明朝，这些作品就源源不断地问世，而且后来者居上，形成了“刊布成帙、举世传诵”的盛况。余氏刻印通俗小说的有余彰德的萃庆堂，余成章、余象斗的三台馆和双峰堂，余郁生的永庆堂等，其中尤以余象斗最为著名，不仅刊行数量大、品种多，本人还编写了不少神魔公案小说。鲁迅先生曾针对这一时期出现的神魔小说做过十分中肯的评价：“凡所敷叙，又非宋以来道士造作之谈，但为人民间巷间意，芜杂浅陋，率无可观，然其力之及于人心者甚大。又或有文人起而结集而润色之，则亦为鸿篇巨制之胚胎也。”<sup>④</sup>

后世的《杨家府演义》、《说岳全传》等演义小说就是在余氏三台馆所刊行的《北宋志传通俗演义》、《大宋中兴英烈传》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余象斗编印的《皇明诸司公案传》对后来的《三侠五义》等义侠公案小说也有启发和影响<sup>⑤</sup>。冯梦龙《警世通言》卷四十的《旌阳宫铁树成妖》直接取材于余氏萃庆堂刊的《许仙铁树记》，《醒世恒言》第十二卷，《吕洞宾飞剑斩黄龙》也取材于《吕仙飞剑记》。万历丙午（1606）年余象斗梓《全像列国志》广告云：

列国一书乃先族叔祖余邵鱼按鉴演义纂集，惟校一付，重刊数次，其板蒙补，校正重刊，全像批判，以便海内君子一览，买者须认双峰堂为记。

后来冯梦龙依据余邵鱼本，“参采史鉴”，把西周一段腰斩，分为一百零八回，定名《新列国志》。蔡元放评定后，又称《东周列国志》，即现在的通行本。《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著名长篇小说，余氏均有刻本，有的甚至一版再版，多次印行。

## 2. 形式方面的特点

为了吸引读者，扩大销路，书坊刻本在图书形式上也时有创新，并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①黑口与书耳。最早使用黑口和书耳是南宋建阳书坊。余仁仲万卷堂所刻的几部经书均为左右双边，细黑口，栏外刊小题。余志安勤有堂刻本中发展为粗黑口，有些栏外有耳，题记篇目。有了黑口就是有了中线，便于折叠、装订，有了书耳便于翻检书中内容，既提高了效率，又方便了读者。

②刊刻汇注本。即把各家不同注释汇编在一起，刻成一部书。有利于读者对各家注释进行比较，对水平不高的初学者尤为方便。唐五代之前的经史典籍，其正文与注疏是分开的，印本书出现之初亦是如此。从南宋开始，出现了“三位一体”和“四位一体”的合刊本，即把经、注疏、音义、释文等刻在一起，其中最著名的是建安黄善夫的《史记》和刘叔刚的《礼记》等。余仁仲也刻了诸如《春秋公羊经传解诂》、《礼记》和《尚书注疏》一类的作品，每卷末均标出经注传音义若干字〔图一〕。勤有堂的《分类补注李太白集注》和《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书集传辑纂注》也颇受读者欢迎。余氏万卷堂有一部《纂图互注重言重意周礼》，也颇受欢迎。所谓“重言”就是把同一书中重复出现的词，注明曾在那一篇中出现过；“重意”就是把语句不同而意思相同的语句也注明出处。这种做法增加了上下文的联系，便于读者查考，也便于举子应试。

③上图下文，图文并重。插图是帮助理解记忆正文内容，增加图书通俗性、趣味性的有效方式。印本书中，最早也是在坊刻

本中使用插图的。前人一直认为余氏勤有堂刊印的《古列女传》为最早<sup>⑥</sup>。徐康在《前尘梦影录》中曾说：“绣像书籍以来，以宋槧列女传为最精。”尽管余靖安刊书年代还有待于进一步讨论，《列女传》的插图是否为顾恺之所画也有待于考定，然而“作为一部有完整的木刻插图的刊本来说，《列女传》的刊本在版画史上应该被列为重要的作品，而它的插图形式，虽不是首倡，但到了《列女传》的刊本，即形成了风格化，这又是在版画插图上有它一定价值的地方。”

随着雕版手工业的发展，到了明朝万历、崇祯年间，插图本无论就数量而言还是就质量而言，都达到了极盛时期，尤其是通俗小说和杂书几乎无书不附插图。这些插图，格调新颖，形式多样，有每回卷首插一页版画的萃庆堂《大备对宗》（图二）、三台馆《三台便览通书正宗》（见上期图二、三、四）；有同一书页，上半栏为图像，下半栏为书文的三台馆《全汉志传》、《南北两宋志传》、《唐虞志传》（图三）、《有夏志传》；有的刊本则是上评、中图、下文，如双峰堂《全像水浒志传评林》、《全像批评三国志》（图四）；还有更新颖的是图嵌文中，如余新安的《荔镜记》（图五）、三台馆的《武功名世英烈传》和萃庆堂的《吕仙飞剑记》等；有的一部书插图几十幅，如永庆堂的《梁武帝传》<sup>⑦</sup>。这些余氏插图本虽不如徽派精致，但古朴简洁，自饶风趣。

④普遍附刻刊记，这也是建阳坊刻及余氏刻本的特点之一。如余仁仲刻《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刊记：

公羊、谷梁二书，书肆苦无善本，谨以家藏监本及江浙诸处官本参校，颇加厘正惟是。陆氏释音字或与正文字不同，如此序酿嘲陆氏，酿作让；隐元年，嫡子作适，归舍作哈，召公作邵；恒四年，日搜作度；若此者众皆不敢以臆见更定，姑两存之，俟知者。绍熙辛亥（1191）孟冬朔日建安余仁仲敬书（图十九）。

早期的刊记反映了刻书者对本书负责，作了一些搜辑和校勘工作，当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争取商业信誉，竞售产品。到了后来，纯商业性的宣传广告特点愈发明显，如余象斗刻《明律正宗》刊记云：

坊间杂刻《明律》，然多沿袭旧例，有琐言而无招拟，有招拟而无告判，读律者病之。本堂近铎此书，遵依新例，上有招拟，中有音释，下有判告琐言，井井有条，凿凿有据，阅者了然。买者可认三台为记，双峰堂余文台识。

明代余氏刻本中，此类广告不胜枚举，虽多为自诩之词，但从另一方面我们也不难看出这些书坊当时的发达活跃程度。书坊主人善于抓住读者心理，不断改进图书内容，从形式上也挖空心思、变换花样，千方百计地招揽生意，使产品自然畅销。

以上这几点说明坊刻本在形式上较官刻、私刻更具有创新精神。从主观上分析，书坊主人这样做，无非是为增强竞争能力，谋取更多的利润。但从客观上分析，坊刻所受的思想束缚较少，接近下层，了解并注重民间需要，敢于标新立异，亦是一重要原因。从而促进了图书事业的发展，也加强了文化的传播。

### 3. 余氏刻书的局限性

余氏刻本是封建社会的一种民间手工业，其目的是为营利。因此，不可避免的存在着局限性，甚至产生过一些消极作用。综合文献记载和现存本状况的分析，可以发现以下问题：

①刻本质量参差不齐，有的书籍内容庸俗，价值低下。如所刻的类书、小说中往往有一些宣扬因果报应、鬼神迷信、色情淫秽内容的篇章。《柳庄麻衣相法》等书，当年曾成批生产、推销。

②刻印技术不精，纸墨粗劣，字迹不清。这种情况在余氏刻本中虽不多见，但到了明末，质量明显下降，如余应虬刻的《诗学会海大成》，余寅伯刻的《四民捷用注解翰墨骏》等书，纸黄墨淡，刻版粗陋，有的书页模糊一片，无法卒读。

③文字校勘水平较低，伪误衍漏较多。余仁仲刻的《九经》

备受推崇，但廖氏世彩堂仍以其“不免误解”，“而合诸本以重刊之。”<sup>⑨</sup>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卷五谈到他订正余志安勤有堂本《唐律疏议》不下数百字<sup>⑩</sup>。可见刊书之不易。仁仲、志安二位还是较注重校勘文字的尚且如此，明代的刻本中错漏就更不胜枚举了。如余象斗三台馆刻的《南北两宋志传》卷首序中把熊大木刻成“大本先生”，余彰德萃庆堂刊的《艺林聚锦故事白眉》目录中卷九地理部，有都邑、市肆、乡村、关隘等目，而书中却找不到市肆一类的内容，都邑、乡村内容也不完整，可见其粗劣。

④有意作伪，以假乱真。在众多的余氏刻书家中，书贾气味最浓的当数余象斗，仅三台馆刻本就可举出几例，如《万用正宗不求人》一书，书后牌记题“万历岁次丁未潭阳余文台梓”，然而在卷十六末又有“万历新岁乔山堂刘少岗绣”，原来是余象斗把刘氏这一卷全部编入己书，匆忙间，连乔山堂牌记都忘了剝去，粗心至此，却在卷端告白中把“坊间诸书杂刻”贬低一通，然后大肆自我吹嘘，结果成了自我讽刺。再如《大宋中兴岳王传》、《唐国志传》这两部小说，本是熊钟谷（大木）所编，而三台馆在翻刻时，却赫然写上“红雪山人余应鳌编次”，把熊大木的序改署“三台馆主人言”，为此花费不少心机，结果还是把《唐国志传》卷一第七则《李密拥众》章“钟谷演义至此，亦笔七言绝句”漏下。余象斗不仅翻人已成之刻，甚至攘别人之作为己！

余氏刻本的局限性，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方面，余氏坊刻的市场主要是中下阶层民众，在封建社会，中下层民众的购买力是有限的。而作为谋生手段的余氏刻书业，只有采取低价售书、薄利多销的原则，才能使本身存在下去并得以发展。为了达到降低书价的目的，就必须降低成本。在这个前提条件限制下，无论是纸、墨、板等原料，还是刻工，都很难达到高标准。例如，要减少篇幅，增加版面容量，就只好压缩字间行距，用建刻特有的瘦长字体。这样的细行小字，刻好了还

算清楚，但看上去就不会有字大行宽、天头高地脚阔的监本那样疏朗悦目。刻版之后又没有用足够的工时认真仔细地校勘，只求速度数量，质量自然要受影响。

另一方面，书坊主人大多不是文人学士，象余象斗、余昌祚等，只能算粗通文墨，谈不上有多深的造诣，他们在组织图书的生产过程中，无法对书籍的内容进行有效的考订。为了谋利赚钱，或剪头去尾，偷工减料，或胡编乱凑、冒名顶替，这些做法，无不给余氏刻本的质量和声誉带来严重后果。这恐怕就是明代后期的余氏刻本不为藏书家或某些学者所重的原因之一，也是余氏刻书业走向衰亡的内在原因吧。

## 二、余氏刻本的流传和影响

余氏刻书持续数百年，苦心经营，久盛不衰，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今，都有相当的影响。

### 1. 在国内的流传影响

余氏刻本在其印行当时就享有较高的声誉，受到官私各家推重。最早为余氏赢得称誉的是余仁仲。岳珂曾评论过：“且以世所传本，互有得失，难于取正，前辈谓兴国于氏本及建阳余氏本为最善。”<sup>①</sup>接下来是余志安《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载勤有堂本《四书通》十六卷后张存中跋谓：“泰定三年（1326）存中奉浙江儒学提举志行杨先生命，以胡先生《四书通》能删纂疏集成之所未删，能发纂疏集成之所未发，大有功于朱子，委命赍付建宁路建阳县书坊刊行，志安余君命工绣梓，度越三稔始克就云云。”明代余彰德，余象斗时也有类似情况。

自影抄翻印技术发展以后，余氏刻本又每被翻板影抄，可考者多达数十种，其中最著名的有：

孙星衍仿刻勤有堂本《唐律疏议》；

阮福仿刻勤有堂本《古列女传》；

汪中仿万卷堂本《春秋公羊经传解诂》；

黎庶昌仿万卷堂本《春秋谷梁经传集解》。

后两种《四部丛书》中亦有影印本。解放后，中华书局还影印了勤有堂本《国朝名臣事略》，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了余象斗校评的《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这都反映了余氏刻本的文献价值和版本价值。

通过上文“知见录”可知，余氏刻本流传遍及全国二十多个省市，有的远至黑龙江、新疆、青海、云南。仅台湾一省，现存余氏刊本就有三十余种，其中包括十几种罕见的宋元善本。

## 2. 在国外的流传影响

余氏刻本很早就传播到国外。南宋末年建阳学者熊禾在为书坊镇同文书院撰写的《上梁文》中就写到：

儿郎伟，抛梁东，书籍日本高丽通；

儿郎伟，抛梁北，万里车书通上国。⑫

清代杨守敬《藏书绝句》“麻沙本”里也提到：“建宁书本满人间，世历三朝远百蛮。”在他编撰的《日本访书志》中著录了《唐律疏义》、《春秋谷梁传十二卷》、《普济本事方十卷》等余氏刻本。现在不仅亚洲的日本和朝鲜，就是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和欧洲的英、法、德等国均有余氏刻本。美国学者卡特（T. F. Carter）在他所著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一书中有一段文字专门写道：

福建建安余氏在宋代以前已经刊板印书，一直继续到明代，达四百多年之久。余氏世业相传，在旧宋板书幅中保留着他们好几代人的姓名；也可以顺便一说，他们所刊刻的经籍，是我们图书馆中所藏最精美的版本。⑬

国外的余氏刻本，以日本所藏数量最多，价值最高。仅以日本宫内省《图书寮汉籍善本书目》著录的十一种为例。国内罕见的宋元善本占一半以上。孙楷弟先生《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中不少余氏所刻的小说，国内也已失传，如《万锦情林》、《新刻全像牛郎织女传》等均是绝无仅有的孤本。上面提到的《水浒传传评林》就是据日本日光慈眼堂藏本影印的。美国国会图书馆

藏余氏本也有十余种，通过王重民先生撰写的提要，我们可知其大部分为明本，且国内亦有复本流传。英、法、德各国所藏数量不多，但价值较高，情况也较复杂。如《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一书，剑桥大学图书馆仅存第七、八两卷，牛津大学图书馆藏十一、十二两卷（见图四），伦敦博物院图书馆仅存第十九、二十两卷，另外西德司徒加、日本京都也有此书残卷。伦敦博物院图书馆藏《刻全像五显灵宫大帝华光天王传》一书，下署“三台馆山人仰止余象斗编、书林昌远堂仕弘李氏梓”；《北方真武祖师玄天上帝出身志传》卷端题“三台山人仰止余象斗编，建邑书林余氏双峰堂梓”，卷末牌子又记“壬寅岁季春月书林熊仰台梓。”两书均为上图下文，半页十行、十七字，当是李仕弘、熊仰台翻余氏双峰堂本，或就余氏原版重印。巴黎图书馆还有一部《新刻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郑振铎先生怀疑亦为余氏双峰堂刻本。此书虽仅存一卷半，因与众本不同，别具一格，颇受《水浒传》的研究者珍视。

至于国外翻刻余氏刻本的记载亦屡见不鲜，仅森立之《经笈访古志》中就有以下数例：

①《新刊补注铜人腧穴鍼灸图经》五卷

元板，不记行年月，每半板十行二十字。按朝鲜国刊此本凡二通，其一整板，其一活字本，体裁俱与此本同，目录末并记崇化余志安刊于勤有堂。盖余氏重刊此本，而朝鲜本均以余氏为祖也。整板仅存三卷，活字既完存，而文字端正，盖是为最佳之本云。<sup>⑭</sup>

②《增注太平惠民和济局方》

朝鲜本则有活字本二通，其一据余志安本者。<sup>⑮</sup>

③《十八史略》

一为元刊本，卷端页头题云“勤德堂刊增修宋季古今通要十八史略”。通略之书，行世久矣，惜其太简，读者憾焉，是编详略得宜，诚便后学，梓与世共之。

另一为七卷本。题云“立斋先生标题解注音释十八史略，正统辛酉孟夏书林余氏新刊”，即翻雕明版者，今活板及通行诸本盖原此本。<sup>⑩</sup>

元刊本是否为余氏勤德堂所刊，还需进一步考证。而后一种明正统辛酉年（1441）为余氏刻本则可确信不疑，它的日本翻印本，大连图书馆至今仍存一部。该馆还藏有日本贞亨二年（1685）影印的余氏萃庆堂的《皇明千家诗》。我国台湾省故宫博物院也藏有朝鲜复明余氏勤德堂的《续古摘奇算法二卷》。美国国会图书馆现藏日本翻元余氏勤德堂的《增修互注礼部韵略》。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编的《善本影谱》中还有一部《千家注杜工部诗》，卷末余志安勤有堂刊记后还刻了这样两行字——“永和大岁柔兆执徐肃霜 京洛大藏坊法印观喜重印”（图六），为日本重刻余氏本。永和丙辰相当于洪武八年（1375），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足以说明余氏刻本的流传之广，影响之大。

## 结 束 语

通过以上初步分析，可以使我们明显地看出包括余氏在内的历代书坊刻书家对我国历史文化的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①从保存文化典籍方面看，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宋元时代的刻本是很有限的，而在这些有限的刻本中，却有不少是建阳书坊刻本，其中仅余氏宋元刻本我们就可以列举出数十种之多。由此可以想见这些刻书家在当时的生产数量之大。

②从传播文化方面看，尤其是对庙堂文化以外的民众文化的传播，余氏书坊由于自始至终扎根于民间，以中下层民众为主要对象，是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的。

③从雕版印刷术的改进与发展方面看，余氏书坊注意吸收劳动人民在版刻艺术上的发明创造，如黑口、书耳、汇注本，插图等形式，起到了推陈出新的作用。

在论及余氏书坊这些成就和贡献时，我们还必须连带地指出

这样一种现象：在我国封建社会，某些封建士大夫及藏书家往往注重于图书的收藏而忽视流通与传播，甚至对其藏书做出“凡非契交，例不示人”“借书不孝”等规定，保存图书之严，有如禁锢。所以，陈登原先生在其所写的《旧五代史之冥求》一文中才说：“夫明明知所有之书，为仅存之秘籍，于是过分珍视，秘而不宣，此藏书家自谓保存文化，实则戕贼文化也。惟其秘而不宣，书遂无由流通，人亦无由抄印，藏书家之子孙，未必人尽爱好，于是或以不肖子孙之损害，或以盗贼水火之侵袭，爱护之仅存硕果，遂致绝迹人间，讵非爱之而适以害之！”<sup>⑦</sup>从这一点来看余氏等书坊刻书家的贡献，又岂在名声显赫的藏书家之下呢？我们难道不该为他们编写一部《书林列传》吗？

当然，余氏刻本也有其缺点，如上文谈到的纸墨粗劣，校勘不精，有意作伪等，但从总体上来看，余氏刻书业的贡献是主要的，不能忽视的。他们所刻的书籍在我国图书发展史上应当占有一定的地位。

#### 注释：

①岳珂《愧郈集》、《四部丛刊续编》卷九。

②王重民《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第3页。

③郑振铎《西谛书目题跋》第10页。

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97页。

⑤方品光《元明建本通俗演义对我国小说发展的影响》《福建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1期第77—73页。

⑥傅惜华《中国古典文学版画选集》“出版说明”中提到“至于文学版画插图，现在所见最早的，要算北宋嘉祐八年（1062）福建建安余氏靖安勤有堂镌刻的《列女传》。”误，见前文。

⑦王伯敏《中国版画史》第32页。

⑧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卷三明清部，著录《精通俗全像梁武帝西来演义十卷四十回》“清永庆堂原刊本。无图。”我在北大图书馆见到的一部，有图四十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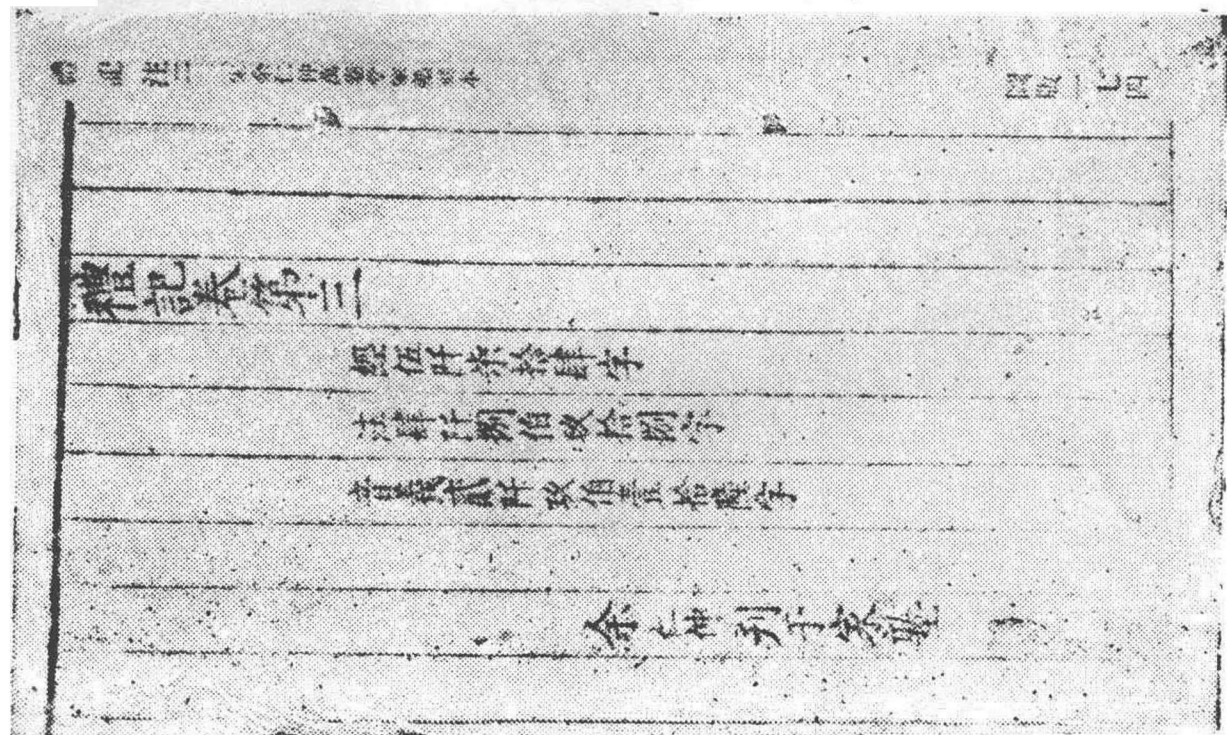
- ⑨《天禄琳琅书目》卷二第8页。  
 ⑩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卷五第16页。  
 ⑪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第1页。  
 ⑫《嘉靖建阳县志》卷六。  
 ⑬(美)卡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第73页。  
 ⑭森立之《经籍访古志》补遗第23页。  
 ⑮同上书补遗第58页。  
 ⑯森立之《经籍访古志》卷三,第20页。  
 ⑰《东方杂志》第二十七卷,十四期第78页。

### 本文主要参考文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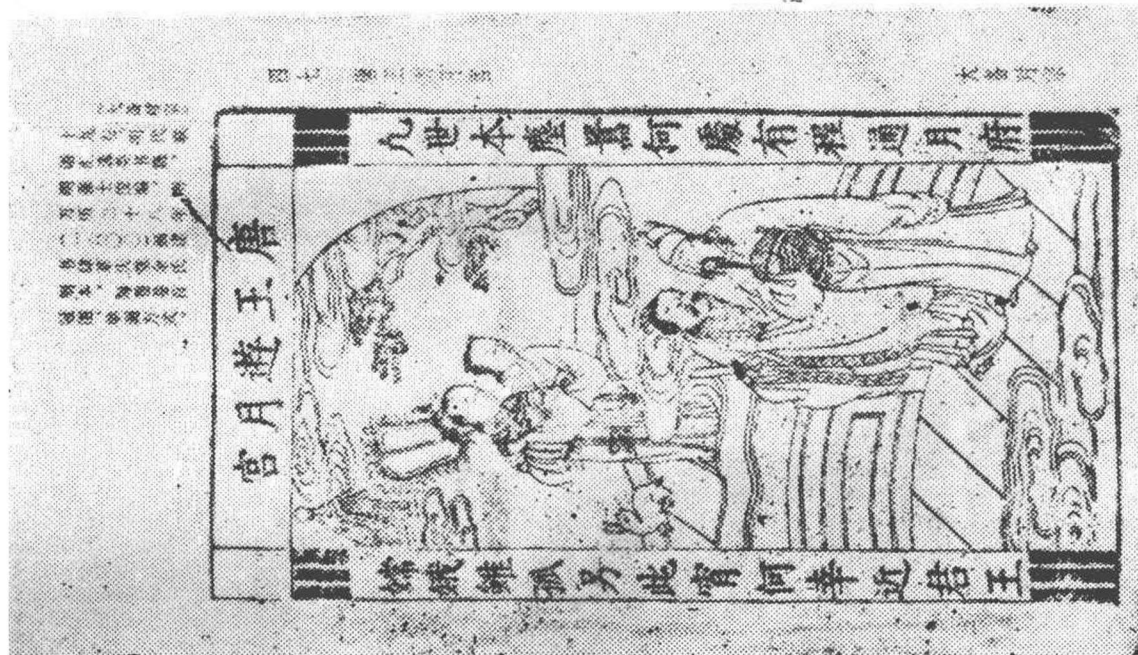
- 古今书刻 (明)周弘祖编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年  
 少室山房笔丛(明)胡应麟撰 北京中华书局 1964年  
 书林清话(清)叶德辉著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57年  
 中国雕版源流考 孙毓修著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4年  
 中国书史 陈彬和查猛济合著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1年  
 版本通义 钱基博著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57年  
 古书版本常谈 毛春翔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年  
 中国文学论集 郑振铎著 开明书店 1947年  
 中国小说史略 鲁迅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话本小说概论 胡士莹著 北京中华书局 1980年  
 中国印刷术发明及其西传 (美)卡特著 吴泽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2年  
 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 张秀民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8年重印本  
 中国书的故事 刘国钧 郑如斯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1979年  
 中国书史简编 刘国钧著 郑如斯订补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2年  
 中国书史参考文选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目录学教研室中国书史教学小组编 1980年

中国书史参考资料 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古籍整理小组编 1980年  
 古书整理参考资料 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古籍整理小组编 1980年  
 图书馆古籍整理(草稿) 张荣起、郑如斯、廖延唐合编 北京大学  
 图书馆学系 油印本 1981年  
 古籍版本知识 中国书店集体编写 油印本 1961年  
 古典小说戏曲丛考 刘修业 北京作家出版社 1958年  
 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 北京图书馆编 北京中华书局 1959年  
 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藏书目录 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编印 1938年  
 故宫善本书目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印行 1934年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书目 北京大学图书馆编 1958年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李氏书目 北京大学图书馆编 1956年  
 北师大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目 北师大图书馆编印 1982年  
 西谛书目 北京图书馆编 北京文物出版社 1963年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 王重民辑录 (美)国会图书馆  
 1957年  
 台湾公藏善本书目书名索引 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编印 1971年  
 中国通俗小说书目 孙楷弟著 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国立北平图书馆  
 1932年  
 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 孙楷弟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  
 铁琴铜剑楼宋金元书影 附识语一卷 瞿启甲编 常熟瞿氏影印本  
 1922年  
 善本影谱 (日)长泽规矩也编 日本书志学会 1932年  
 故宫善本书影初编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编印 1929年  
 嘉业堂善本书影 刘承干编 嘉业堂影印本 1929年  
 古逸丛书 (清)黎庶昌辑 遵义黎氏日本东京使署影印本清光绪年间  
 中国丛书综录 上海图书馆编 北京中华书局 1959—1962年 (附录  
 3所列书目,亦为参考文献,此不重复)  
 书林余氏宗谱 (清)余振豪等修 福建省图书馆据光绪丙申(1896)  
 年重刊本抄 十二册  
 福建版本志十卷 陈衍编 1938年 铅印本  
 建阳县志(嘉靖)十五卷 (明)冯继科纂上海古籍书店据宁波天一阁  
 明嘉靖刻本影印 196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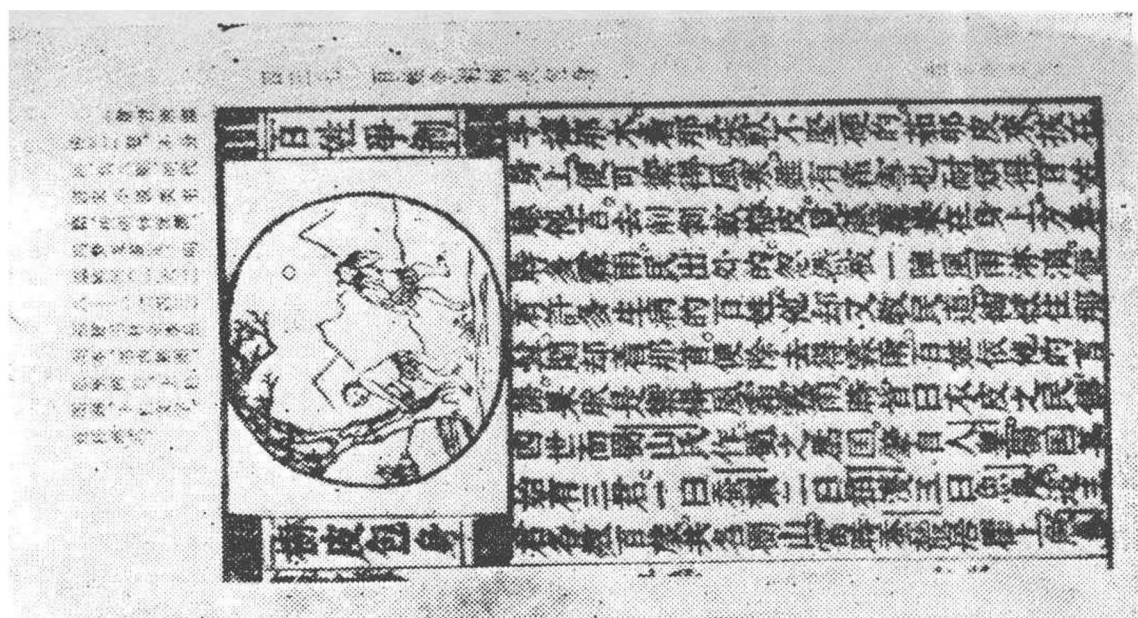
- 建阳县志(道光)十九卷(清)梁輿等主修 福建省图书馆据道光年间刻本钞
- 建阳县志(民国十八年)王宝仁纂修 民国十八年建甌新明印刷所  
福建版本资料汇编 方品光编 福建师大图书馆 1979年
- 中国版画史 王伯敏著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61年
- 中国古典文学版画选集 傅惜华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78年
- 中国历史地图集(1—8集)本书编辑组编辑 北京中华地图学社
- 中国刻版的发展过程 赵万里 《人民日报》1961年5月4日
- 我国优秀的雕版印刷书籍 冀淑英 《图书馆工作》北京图书馆 1957  
年第2期
- 南宋(1127—1279年)刻书地域考 张秀民 《图书馆》 1961年第3期
- 明代刻书最多的建宁书坊 张秀民 《文物》 1979年第6期
- 南宋的雕版印刷 宿白 《文物》 1962年第1期
- 版本通论 吴则虞 《四川图书馆》 1978年第4期, 1979年第1、  
2、3、4期
- 闽本考 叶长青 《图书馆季刊》 第2卷第1期
- 福建版本在中国文化史上之地位 张贻惠 《福建文化》第十集 第7期
- 福建版本史述略 冶心 《福建文化》第2集第12期
- 麻沙书话 朱维干 福建文化(季刊)第1卷第1期
- 略谈福建的刻书 谢水顺 《福建省图书馆学会通讯》 1980年第4期
- 略谈福建坊肆刻书的几个特点 卢维春 《福建省图书馆学会》 1980  
年科学讨论会论文集
- 谈谈明刻本及刻工 冀淑英 《文献》第七辑
- 南行日记 赵万里 《文物》 1962年9—10合期
- 谈谈《古今书刻》上编的意义和作用 钱亚新 《广东图书馆学刊》  
1982年第1期
- 元明建本通俗演义对我国小说发展的影响 方品光 《福建师大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2年第1期
- 建刻兴衰——建阳刻书事业述评 陈慧杰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  
1981年毕业论文(稿本)1980年12月
- 建安余氏刻书考 梁子涵 《福建文献》(台北)第1卷第1期 196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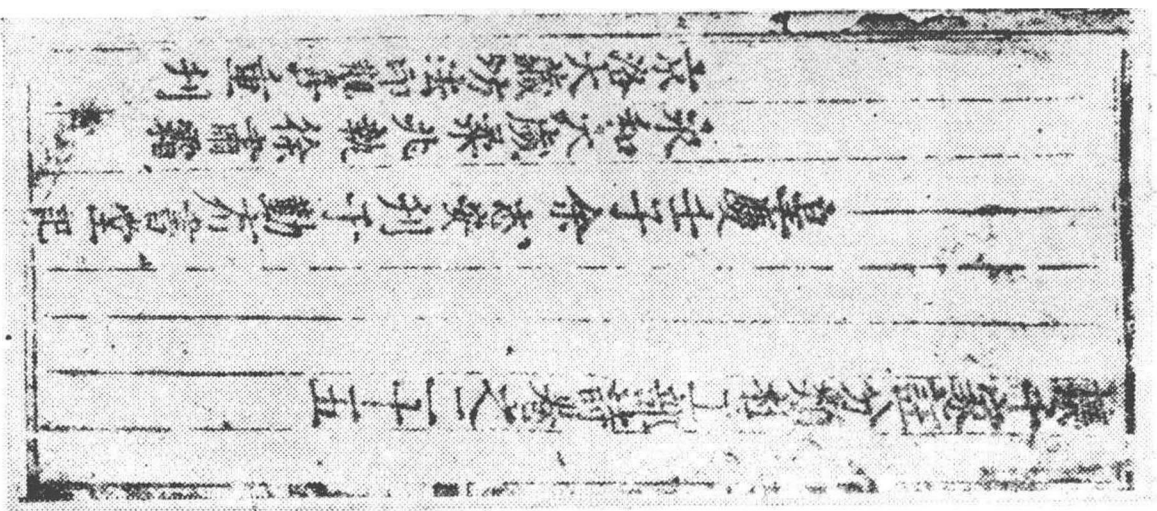
图一



图二  
建陽余氏刻书书影



图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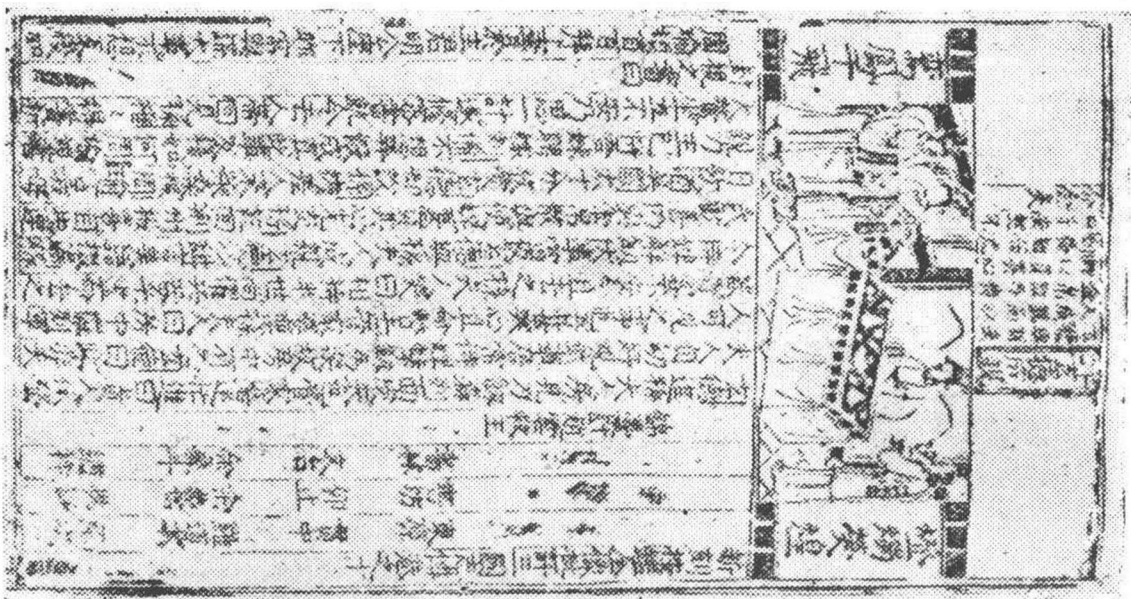


图六



图五

建陽余氏刻書書影



图四